

一 山东书院的演变

书院是唐末以来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至于它到底是怎样一种性质的教育组织，目前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为，书院是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私人藏书、聚徒讲学。它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但由于山东特殊的历史原因，其演变轨迹并不与全国同步。

（一）书院的萌芽

1. 书院名称的由来

书院名称的产生与中国古代修书、重视图书收藏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以绚烂多彩、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著称于世，其标志之一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各种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书，在纸尚未

发明之前就已存在。《庄子·天下篇》有“学富五车”的故事，后来以此比喻人的学识渊博。其实那时候的书都是以竹简作为载体的，即使有“五车”多的书，现在看来也只不过等于几本纸质书。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许多重要的图书典籍佚失，这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图书的收藏，也开始重视修书活动。

汉初天下始定，图籍散乱，刘邦分别命令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等人编列法律，申明军法，编制章程，制定礼仪，其中便包括了校理古籍的工作。汉武帝即位后，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还广开献书之路，建立藏书制度，设置写书之官，上至经书，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哀帝时，刘向之子刘歆编定了我国第一部图书目录《七略》。汉代还有兰台、东观等藏书修书处。

汉代以后，每一次朝代更替之际，都有不少图书典籍毁于兵火；而每一新王朝开国之初，几乎都要做一番搜集遗书工作。这是统治者文治教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而被延续下来。

唐代开国后，广泛收罗前代遗籍，购求散佚文献。首先由魏徵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颜师古考订《五经》后又开史馆，编《隋书·经籍志》，开官修前代史书之先河。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五年（717），唐朝政府组织文人于乾元殿校理经籍。为

此，遂将乾元殿更名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又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集贤殿书院藏书 81990 卷，设有校理、待制、侍讲、勘校、修撰、修书等官，这些官职大多是为校勘书籍而设，同时也备为皇帝顾问，为国家推荐人才，并兼侍讲之职。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书院”名称实起源于“修书”这一传统的文化事业。这种设置于中央的官立书院，实际上是围绕“书”而进行工作的官署。作为“书院”之滥觞的丽正修书院，正是这样一个设于朝省的藏书和修书的机构，它与汉代的东观、兰台，清代的文渊诸阁相同。作为一个官方学术机构，书院最初的任务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选用和参考，和后来意义上的书院根本不同。

2. 书院成为一种教育制度

书院之所以能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不仅由于继承了古代重视藏书、修书的文化传统，还由于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中私人讲学的传统。

中国的私人讲学之风可以追溯到先秦。孔子开拓了私人讲学之风，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他号称弟子三千，单单身通六艺者即达七十二人之多，可见其私学的规模。而比孔子稍晚的墨子，也

以广招门徒、私人讲学而闻名，他的“弟子弥丰，充满天下”，更形成了有严格纪律和制度法仪的近乎“结社”的团体。而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则是战国时期的东方文化圣地，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称为“稷下书院”，其官私合办自由讲学的组织形式更是对后世书院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秦代虽明令禁止私学，而事实上私人讲学禁而不止。至汉代私人讲学蓬勃兴起，郑玄回乡后，刻意研经，并聚徒讲学，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人数达千人以上。在汉代私人讲学日盛、生徒日增以及一些隐士避乱远世的社会风尚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以讲学者所在之地而命名、较为固定的讲学、治学和学习的场所——“精舍”、“精庐”，成为后来书院教育的雏形。

到了唐代出现了一些被称作“书院”的私人读书处，如李秘书院、杜中丞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它们大多见于唐人诗篇，但并不是授徒之所。山东最早的书院——临朐县的李公书院，即是这种类型的书院。据明嘉靖《青州府志》卷 9 记载：李公书院在县（临朐）西南，是唐人李靖的读书处。相传李靖跟从唐太宗李世民征闾左，曾在此研读兵法。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熟兵法，隋末任马邑郡丞。归唐后，随高祖、太宗征战南北，深得李世民赏识，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著有

《李卫公兵法》。既然是李靖跟随唐太宗征辽时的读书研究兵法之处，因此李公书院的建立时间应不晚于7世纪初。

作为讲学授徒培养人才的书院，始于唐末五代。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不止，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只有选择幽静之地建舍聚徒，授学论道，私家讲学之风遂兴，书院教育应运而生。当时的青州临淄（今淄博临淄）人石昂，家有藏书数千卷，许多士人慕名前来求教，有些人竟吃住在石昂家里，而石昂并不感到厌烦，仍主动邀请周围的人聚众讲学，一时传为美谈。石昂聚众讲学之所已无从考察其名称，但其书院的特征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一般认为，南唐建立的东佳书堂和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具有了私人藏书、聚徒讲学的特征，是书院教育诞生的标志。从此以后，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开始登上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

（二）书院的发展

1. 宋代书院的初步发展

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统治人才。社会的需求刺激了教育，书院便呈现出繁荣

兴旺的状态。

具体说来，宋初书院的繁盛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宋初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这是书院教育兴起的重要原因。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破坏，到了宋代，地方官学已近瘫痪。各地郡县残存的一些破旧孔庙，除了勉强维持一些象征性的祭孔仪式之外，几乎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教学活动，也不具备招生设教的条件。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曾谈到，宋初地方官学除兖州、颍州（今安徽阜阳）一带之外，大部分地区均未曾设立，学者大都集中在书院聚徒讲学，并且卓有成就。官学不兴，士人寻求出路，国家又急需人才，于是包括书院在内的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乡党之学率先得到发展。书院起到了补充官学空白的作用。

其次，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也是促进书院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科举取士方面，北宋前期仍沿袭唐代旧制，但科举的要求大幅度放宽了，规定获取人才不问家世，这无疑提高了士子应考的热情。而且每次科举取士的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进士每次只有三四十人，最多的只有 70 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少官吏，开始大规模录取士人，每次录取进士约 230 余人。宋真宗后，进士录取人数大增，平均每次录取在 450 人左右。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的扩大，直接刺激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第三，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的政策，是宋初书院得以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自唐朝后期以来，军阀混战，武人专横跋扈，朝代更迭频繁。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统治，宋朝统治者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极力对武臣加以裁抑，实行了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方针。宋太祖就认为宰相必须使用读书人，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告诫后人说：帝王之子一定要熟读经书，这样才能明白国家治乱的道理。他以兴隆学校为心，在京师建立了国子监。但因为国家刚刚建立，无力创办大量的官学，书院的兴起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又教育力量不足的矛盾。宋初统治者便因势利导，给书院以大力支持。

第四，私家讲学之风的盛行又为书院的繁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北宋初年，私家讲学的山东人人众多，如诸城人齐得一，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前来求教，跟随他学习；淄川人王樵博通群书，不治章句，许多人慕名前来就学；安丘人杨光辅更是在莒县马耆山聚徒讲授 20 余年，远近士子皆出于他的门下。

在这种状况下，书院开始大量出现。据有些学者统计，北宋先后存在的书院达百余所，是唐五代书院的三倍。但书院的分布并不平均，存在着严重的地域差异。据曹松叶先生《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如将宋代书院以河流所经地域计算，长江流域占

74.76%，珠江流域占 21.53%，黄河流域仅占 3.52%，南方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北方。书院数量在 5 所以上的省份分别为：江西 23 所、湖南 8 所、山东 5 所、河南 5 所。山东的 5 所书院分别是汶上的圣泽书院、泰安的泰山书院、郛城的岳麓书院、莒州的文学书院以及益都的白龙洞书院。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书院数量虽不及江南各省，但却拥有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泰山书院。

在宋初书院的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书院以其丰富的数学内容和卓有成效的教学模式，赢得了世人的瞩目，成为对当时教育影响较大的著名书院。这些著名书院有“四大书院”之称，泰山书院便在其中。关于宋初的“四大书院”，共有三种说法。一说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和王应麟的《玉海》指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二说见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去嵩阳书院而增石鼓书院。另有一说，见于光绪六年（1880）刻本《国朝石鼓志》，称宋初四大书院为：徂徕、金山、岳麓、石鼓，这儿的“徂徕”似应指泰山书院。

泰山书院原为道家诗人周朴修隐之地，名栖真观。宋景祐二年（1035），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孙复应石介之请来泰山讲学，景祐四年在东岳庙建

信道堂学舍。第二年学舍迁栖真观旧址。康定元年（1040）石介为书院作记，始称泰山书院。孙复被称为泰山先生，主持书院的讲学活动。泰山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文史群书，尤以《周易》、《春秋》为重，并有学术研究与交流。与孙复、石介同时在泰山书院读书、研习的还有泰州的胡瑗，由于三人儒术高深，名声日隆，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一时慕名而来的士子很多，如姜潜、张洄、刘牧、祖无择、李缙、张续、李常、李堂等先后肄业其中，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泰山学派”。

北宋时期，山东各地书院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除个别书院外，多数书院斋舍简陋，其他许多内部规制如招收生徒、考试制度、学习科目和师资聘请也多不健全。有些书院得到了官府的资助，如汶上的圣泽书院，相传为孔子任中都（汶上在周代时称中都邑）宰时与诸弟子讲学的地方，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元祐四年（1089），宰驿周师中加以重建。但大部分仍以私人或民间办学为主。

到北宋中期，书院逐渐开始衰落。首先，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是造成书院衰落的直接原因。正如前面所说，书院的兴起是由于官学不兴，书院的兴办起到了补充官学空白的作用。随着政治的稳定，宋朝统治者开始加强官府办学，这就是所谓的“兴学运动”。兴学运动共有三次，分别为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

兴学。北宋三次兴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书院，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很少过问。不闻不问，实际上等于冷落了书院，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结果，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日渐沉寂。其次，北宋中期以后，有关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方面的法令条规日益细密。朝廷规定：禁止士子离开居住地参加科考，各地学校只能招收本地籍贯的士子读书；应举士子要提供官给文书作为担保，否则便失去应举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以广招天下有志之士为宗旨的书院，就失去了生员来源，更由于无力提供相应的官给文书，书院不可避免地沉寂下去。第三，书院的好坏与书院主讲的好坏直接相连，在三次兴学运动中，一批书院主讲先后被中央或地方官学聘任，这无疑削弱了书院的教学水平，影响了书院的声誉，许多书院因此而逐渐废弛。像泰山书院，庆历二年（1042）孙复经石介介绍，范仲淹、富弼推荐，赴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从此泰山书院遂告消歇。

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然而，南宋时期的山东却处于金的统治下，这就使得山东书院的发展错过了最佳时机。

虽然金朝统治者在所占领地区，尽量保持业已形成的科举取士制度，并且兼采唐、宋及辽代故制，加以损益，形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独特风格的选士制度。金天德年间曾规定府试有 6 处地点，东平府即其中之一。而大定二十年（1180）规定，府试策论进士地点 4 处，东平亦为 1 处，后增添益都（今山东青州市）1 处；其余辞赋、经义、律科、经童科府试地点定为 6 处，东平也在其中，后添益都。这些都反映了科举在金代的地位及金统治者对山东的重视程度。但金统治者对于书院的建设却不甚关心，只新建了武城的弦歌书院（金大定年间）和日照的状元书院。

2. 元代山东书院进入快速发展期

13 世纪 70 年代，蒙元政权挥师南下，消灭南宋政权。这样，中国古代书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元朝统治者虽是少数民族，但在进入中原后就已开始封建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代在文教政策上采取了“汉化”方针。首先是尊孔崇儒，至元四年（1267）正月，元世祖下令修建曲阜孔庙，五月又在上都（在今内蒙古）新建孔子庙，并将在战乱时被人掠卖的儒士由官府赎买为民。接着又下令，凡儒户徭役，一切蠲免。元成宗于即位的当年（1294）就颁诏兴学。诏令中外百司官吏：“孔子之道，垂宪万世，

有国家者，所当崇奉”，表达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崇敬之情。元英宗则称赞真德秀《大学衍义》：“修身治国，无逾此书。”其对儒学的崇尚之情溢于言表。在尊孔崇儒活动的推动下，孔子的地位急剧上升，孔子在武宗朝竟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次，重视中原知识分子，如耶律楚材、王楫、李藻、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阎复、徐琰、孟祺、李谦等都曾在元朝任职。

服务于“汉化”政策，元代统治者初时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政策，继而大力发展书院。中统二年（1261）六月，元世祖下令保护一切文化教育设施，规定孔庙及各级书院不得侵扰褻渎，违者加罚。至元八年（1291）三月，元世祖命各路各县设立小学，同时鼓励“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贍学者，并立为书院”。此后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就全国而言，宋元两朝的兴废更替中止了南宋时期书院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对于山东而言，元朝的建立迎来了书院的快速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元朝存在短短 97 年间，山东共新建书院 22 所，修复书院 2 所（详见“元代山东书院一览表”）

表一 元代山东书院一览表

书院名称	所在地	建立时间	备注
龙山书院	东平	至元三十年 (1293)	
中庸书院	邹县	元贞元年 (1295)	又名子思书院, 祭祀子思、孟子。
东山书院	费县	皇庆二年 (1313)	初为义学, 后改书院。
郑康成书院	淄川	不详, 元延祐二年 (1315) 重修	又名康成书院
性善书院	滕州	延祐元年 (1314)	
闵子书院	济南	天历年间	济南最早的书院
明诚书院	乐安 (今广饶)	元统前后	
尼山书院	曲阜	后至元三年 (1336)	
静轩书院	高唐	后至元年间	又名静山书院
一贯书院	郟城	至正二年 (1342)	又名曾子书院、琴声书院、宗圣书院, 祭祀曾子。
洙泗书院	曲阜	至正十年 (1350)	又名洙泗讲学书院
崇义书院	濮州 (今鄄城)	至正十二年 (1352)	
思圣书院	费县	至正十三年 (1353)	为思念孔子而捐建

(续表)

书院名称	所在地	建立时间	备注
伏生书院	邹平	至正十五年 (1355)	为纪念济南学者、西汉今文《尚书》之最早传授者伏生而建。
历山书院	濮州	大德年间	
雪林书院	朝城	不详	元楚惟善读书处
牛山书院	肥城	不详	元尚书张起岩书室
育英书院	肥城	不详	
北麓书院	蒙阴	不详	元张子塾隐居教授于此
野斋书院	东阿	不详	元翰林李谦卒, 谥文正公, 诏立书院。
会斋书院	恩县	不详	元张汝卿读书处
宗圣书院	嘉祥	不详	又名曾子书院
白龙洞书院	青州	不详	
王氏书院	兰山 (今临沂市兰山区)	元代	

元代书院的设立与宋代已大不相同。宋代书院基本上由私人或民间设立, 元代除了仍大力提倡私人或民间设立外, 开始由官府直接创办或修复书院, 即使

是私人或民办的书院，朝廷和各级官府也逐步加强了控制。滕州的性善书院一开始是所义塾，创建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创建人为州守尚敏。延祐元年（1314）经监察御史任居敬奏请，将其改为书院，并取孟子“性善”说之意称为“性善书院”。从此以后，该书院划归学宫管理，委派了山长，聘请了教师，以加强对肄业学生的教育。延祐二年，州守又将书院改建扩大。扩建后的性善书院占地 8 亩，右边是孟庙，以祀孟子，左边是讲堂，并有东西配房供学生习业。至正年间，由于书院年久失修，山长丁振又请示州官募捐重修，整饰一新。性善书院是一个典型的由官府接手创办或修复的书院，从其办学过程不难看出书院官学化的特征。

官学化是元代书院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书院教育的组织形式在两宋时期就已有官学与私学性质之分，元代只是继续了宋代以来书院官学化的进程。但与两宋不同的是，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更加全面、彻底。

元朝政府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乃至经费供给等都加强了控制。元朝有相当数量的书院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书院山长职位同学宫学正相当，学录、教谕经过两次国家考试可升为学正和山长，学正和山长经过考试可升为中州教授，再经

过考试可升为路教授。这样就使得书院管理者成为朝廷的命官。即使私人创办的书院，朝廷也往往下令任命修建者或先贤后裔为书院山长，予以名义上的承认以加强控制。如曲阜的洙泗书院原为孔子 55 代孙孔克钦所建，朝廷于是任命孔子 53 代孙孔滨为山长。在书院的管理上，元朝政府也有相应的措施。如元朝政府曾规定：凡肄业于州县学及书院的生徒，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都必须经地方官吏的举荐与考核。对书院的招生、考试、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等一系列管理和人事方面的问题都严加控制。元代各级官府增加经费直接兴办书院，为书院划拨学田，并规定山长授官衔、领官俸，书院享受与各级官学同样的官俸待遇；对经费困难的民间或私办书院，也尽量给予经费上的资助。同时，对书院的财务加强管理和控制，明确规定：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一职掌管钱谷的出入。

以上措施，表明了官府对书院的重视，并且为书院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办学条件。当然，这些措施也导致了书院在经营管理上独立自主地位的削弱，书院教育的特色日益淡薄。书院与官学相差无几，仅有书院之名，而乏书院之实了。

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元代还采取给新建书院书匾赐额的方式，以表示国家对书院的认同。滕州性善书院，朝廷赐额“性善”；郟城一贯书院，初称曾

子书院，至正二年（1342）提举管文通倡议兴建，朝廷颁“曾子书院”额；乐安（今广饶县）明诚书院，由邑人程鹏捐资修建，元统二年（1334），朝廷赐“明诚”额。另外，曲阜尼山书院、洙泗书院、高唐州静轩（静山）书院、东阿野斋书院、濮州历山书院也都先后被书匾赐额。

在书院的官学化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许多书院祭祀功能逐步增强，影响了书院的教学功能。北宋时期，书院即已具有祭祀功能，当时的圣泽书院在改建为书院之前就一直祭祀孔子。到了元代，书院祭祀对象更加广泛，举凡先贤、名儒无不在祭祀之列。在元代存在的 24 所书院中，有祭祀功能的书院达 11 所，它们是：邹县中庸（子思）书院祭祀子思与孟子，滕州性善书院祭祀孟子，曲阜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祭祀孔子，郟城一贯（宗圣、琴声）书院祭祀曾子，费县思圣书院祭祀孔子，邹平伏生书院祭祀济南学者、西汉今文《尚书》之最早传授者伏生，东阿野斋书院祭祀元代著名学者李谦，嘉祥宗圣（曾子）书院祭祀曾子，淄川郑康成书院则祭祀汉代学者郑玄。这些祭祀书院占整个书院的 45.8%，也就是说山东当时近一半的书院具有祭祀功能。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书院官学化的另一种表现，这无疑在向书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兴办的各级学校才是主要的教育场所，各地书院不过只是祭祀先儒、名贤的